

皖西省委在霍邱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皖西省委，在周围群众中都知道叫省动委会。机关设立之后，有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骑马、坐轿的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我党工作人员，有未公开身份着便服的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

李丰平同志经常为了通盘考虑省委工作，听取各地请示汇报，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吴皓除协助李丰平研究处理省委工作外，还经常深入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组织中去检查、了解工作情况，有时直接到群众中去。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他是本地人，深知当地风俗民情，以丰富的群众语言，讲解团结战斗、抗日救国等革命道理，很受群众欢迎。直到现在，有些老乡亲对吴引兵(吴皓原名)同志，都还有深刻的印象和敬佩的心情。

还有一位中等身材，留着短发、穿着学生时装的女同志文芸，在群众中也有名。因为在当时，能够见到一位女教师、女职员式的女同志，是很稀奇的，所以，很快就在四乡八村传开了。她虽是异乡人，却和当地妇女姐妹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她经常到农村穿家小户，从帮助做“家务”起，逐步建立感情，讲解妇女翻身求解放和抗日救亡的道理，进而发展抗敌妇女协会组织。有时她还以动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到各群团组织、学校去教唱进步歌曲，帮助演“文明戏”，出墙报等。她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鼓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健全了各种组织，各方面工作在群众中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取得霍邱中心县委、霍邱县委一致意见后，省委给中原局发请示电，准备在全县范围内举行武装暴动。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以郑(位三)名义的复电批准，同时还指示：“如果队伍拉起来了，可在霍邱、固始交界处活动”等。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准备。担任霍邱县长的谢同志，已掌握了县常备队的领导权。他们的暴动方案是：先把县里的武装集中起来，召开干部会议，准备4月1日正式暴动。由谢出面公开宣布，并成立暴动政权，不干的就缴他们的枪。对区、乡武装，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分别就地解决。已经拉好“箭在弦，刀出鞘”的架势，只要一声令下，立即可以举行全县规模的大暴动。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此事，即以“胡服”名义电令“立即停止暴动”。这是为了缓和同李品仙的关系，采取与顽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皖东、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刚建立，尚未巩固，我党同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如果采取暴动，给了敌人攻击我党的借口，更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根据地有可能同时遭到日、伪、顽三面的夹击，于扩大巩固根据地极为不利。并且霍邱又远离皖东、皖北根据地，接应部队不易伸进，暴动后的武装也不易拉出去。

少奇同志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这样决定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个别地方操之过急，已抢先行动；县里通往省政府(立煌)的电话线已被剪断，长集、众兴集等地已缴了

3个乡公所，党的组织和行动计划已经暴露。国民党内部已指名通缉谢、许、李、任、王、光宇等同志。于是只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撤退、转移工作。

撤退、转移也是一件极其艰巨、复杂的工作。如果全体同志集体转移，目标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走不出去；个别分散地转移，后撤的同志，可能会遇到危险。经过省委、中心县委、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周密分析，最后决定：一路去皖东抗日根据地，一路去皖北新四军六支队，一路去舒无游击纵队。人员采取分期分批，先走有名望的、身份公开的、影响大的同志，后走身份未公开，不易被敌人发现或影响较小的同志。对于电台，原来准备装到棺材里，抬出敌占区。经过分析认为：霍邱距我根据地较远，抬着棺材行动很慢，而且沿途敌岗哨多，容易看出破绽。因此，决定就地掩埋起来。

根据上述决定，于1940年4月下旬开始，首先谢、王同志换上便衣，从县内的马龙庙经固始安全到达了豫皖苏区新四军六支队所在地涡阳兴集。接着李丰平、吴皓等部分别化装到了四支队。文芸是女同志，行动不便，暂时隐藏在吴皓的堂兄和姐姐家，后来局势安定，才安全转移到根据地。在转移过程中，因王光宇同志的家在安徽、河南交界的霍邱李集，比较偏僻，就以这里为联络点，把有病、病的同志都暂时转移在这里养病。李任之同志病好后，于5月底也到了六支队。周瑞锦(王光)同志，自始至终为转移的同志写介绍信，待同志们都安全转移后，他最后于6月份到达了定远。

刘锐锋本人，由于有家庭、财产，无法转移，只得在当地暂时隐蔽起来。后来，国民党六安行政督察专员林中奇“清剿”异党，逮去了刘锐锋的父亲刘仲武，经过托人作保而安全释放回乡。因迫于形势，刘锐锋化名刘耀南，到位于立煌县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谋事”去了。尽管他后来干了伪职，还是把电台安全地保护下来，到1949年当地解放，他就将这部完整的电台交给了洪集乡人民政府逐级上交了。他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所以当地政府和群众，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有给他按照地主看待。

皖西省委在霍邱，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对领导当时霍邱地区乃至皖西地区的革命工作，尤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正确决定，给下级组织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和影响作用。在组织撤退和转移时，由于正确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作出了果断的措施，使我党的主要工作人员安全转移，电台也没有受到损失。1947年秋天，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干部大队来到这里，又以这一带地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1949年，这里和全国一样获得了彻底解放。(下)

来源：学习强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著名的六霍起义胜利90周年。重温这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斗争，对于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传承红色基因、激发老区人民爱国热情、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六安，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六霍起义是以六安、霍山等地为中心区域，以农民暴动为主体和民兵兵变相结合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总称，是土地革命时期继黄麻起义、商南起义(立夏节起义)之后，在鄂豫皖边区爆发的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红三十三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安地区党组织领导农民运动走向成熟

1927年8月初，中共六安特别区委成立后，就着手在六安、霍山、霍邱、合肥4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宣传土地革命，组织秘密武装，准备起义。1928年夏，六安、霍山、霍邱等地遭遇大旱，加之军阀混战、兵匪掠夺、捐税苛重和地主疯狂逼租追债，广大农民饥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六安地区党组织通过领导农民协会，组织农民群众普遍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丁、抗夫斗争，引导农民群众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

1929年5月，霍山诸佛庵民团起义、六安武陟山农民暴动、六安南庄(今属金寨县)六保联络自卫团起义相继举行，拉开了六霍地区农民起义的序幕。1929年10月初，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县委家集召开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6县党代表会议，讨论和检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以加强对上述6个县的领导，并决定11月15日在六安、霍山一带发动武装起义。

突发！独山农民起义提前爆发

11月7日晚，六安3名农协会会员遭敌自卫团逮捕，关押独山马氏祠，并被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

搜去二乡农协会会员花名册。在紧急关头，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连夜研究决定提前暴动。8日天刚亮，上万名协会会员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镇。下午4时许，起义队伍围攻自卫团，迫敌无条件释放农友，交出花名册、缴枪10支。入夜，马氏祠之敌纵火烧房，趁群众救火之际逃往苏家埠。起义军占领独山。9日，六安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赶到独山，开会研究决定紧急通知六安各区区和临近各县立即举行起义响应，并成立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组建游击纵队和2300余人的赤卫队。随后，西两河口、郝家集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六安三区15个乡范围内全都飘起革命红旗。

西镇是霍山西部山区统称，包括漫水河、大化坪、上土市和今天金寨县的燕子河、闻家店一带，纵横100余里。国民党霍山县政府在漫水河设置了西镇事务所、自卫团和经济维持会等机构。独山暴动后，中共霍山县委成员深入西镇一带布置，并邀请红三十二师来西镇支援。11月19日，红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带80多名战士连夜赶到闻家店，在当地农民赤卫队200多人配合下，一举击溃驻闻家店的自卫团。到21日先后攻下闻家店、燕子河、楼房湾、长山冲和漫水河等村。西镇暴动胜利后，在漫水河和燕子河分别成立了五区、六区苏维埃政府。在西镇地区建立了西镇革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组建了360多人的西镇游击队。

为排除独山和西镇之间的交通阻碍，六安中心县委令西镇游击队北进，支援霍山北部桃源河、石家河、新店河、黑石渡等地农民暴动，在诸佛庵成立霍山七区苏维埃政府，使六安、霍山两块红色区域连接起来。

组建主力红军，掀起起义高潮

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六安中心县委积极组建主力红军。1930年1月20日，独山起义武装、西镇起义武装和六安六区游击大队在流波汇合，六安中心县委将其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党代表



舒传贤(1899—1931)

鲍益三，师党委书记姜镜堂，政治部主任张建民。红三十三师是红三十二师成立之后，在六安诞生的第二支主力红军队伍，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源头。

六霍起义的烽火燃遍了皖西大地，随着潜山、岳西、英山及舒城、六安边界地区农民相继发动起义，初步创建了东起淠河，西接商南，南抵金家寨、水吼岭，北至白塔墩、丁家集，南北200多里，东西100多里，人口40万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六霍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皖西地区的反动势力，极大地鼓舞了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为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六霍起义的爆发再次证明：六安是一片红土地，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是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见证地。六霍起义深刻体现了“坚贞忠诚、牺牲奉献、一心为民、永跟党走”的大别山精神，六霍起义的卓著功勋将彪炳史册。回望历史，展望未来，我们要更好地传承好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守护好初心使命，凝聚建设美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途建功立业、砥砺奋进。

传承红色基因 牢记初心使命

刘晓芬 陈康



独山暴动指挥部旧址

建国之初搬运装卸就是一种行业。从业人员凭体力吃饭，所用工具也很简单，俗云：“扁担箩筐绳，竹杠大手巾”。1950年六安城区的搬运装卸工人，组成了“六安县搬运站”，有工人170余人。后来由于有了大轱辘小板车(以后改为如今常见的小轱辘)运载效率较之肩扛人抬箩筐装的效率提高数倍，工人收入也大大提高了。群众有云：“要穿梭罗缎，就跟搬运站”。因此，市民中不少无业人员选择以拉小板车为职业。为方便联系活计，那些拉散车的人员多人联合组成了小集体车架组，对外称某某车架组，便于接纳业务。工作主要由调度人员与外界联系。每天早晨临时安排活计。那些搬运工人便早早起来，前往车架组等候派活。派活场所挂有工人名字的竹牌，临到自己就知道今天干什么活。我父亲参加的车架组就在鼓楼街人武部的隔壁，工人习惯地称那里叫“大公馆”。

从事搬运装卸行业所用工具很简单。最基本的劳动工具就是一辆小板车。与之配套的有车厢、绳索。车下还要有网袋(或小工具箱)，供装打气筒、胶水、剪刀、旧内胎皮。尤其要备有一个瓦罐式的车头壶，供装茶水之用。至于草帽、大手巾，这些小物件也必不可少。

车上工具各有其用。小板车本身是装载工具；车厢用于装沙石、砖渣、煤灰；绳索用于捆绑货物；城区内道路高洼不平，走起来往东歪西晃，轮胎放炮是常事。无论自己补，还是别人补，气筒、胶水之类补胎用具绝不可少；陶制品车头壶，便于装茶水，用来解渴。夏日也常用来装井水，既解暑，又解渴。长途中喝了之后一个坡上走，一身汗出来，不知多么舒坦，根本不用担心会泻肚拉稀。说到大手巾，那是长约六尺的家布(俗称白老布)，夏日拉车走在肩上，既凉爽又可擦汗，省了一件汗褂。如果抬杠在粮站(库)里，还可防尘护衣。

拉小板车活计有长途、短途之分。因为那时交通并不发达，汽车很少，城乡物资交流，靠肩挑人挑，甚至手推车，小板车相对来说：运载量大，成本低，因此显得很重要，所以就有长短途之分。所谓短途就是在六安城区范围内搬运装卸，通常是早出晚归。所谓长途就是走出六安城区之外的四乡八镇，往往是二三十里，直至七八十里，甚至更远一些。我曾随父亲，车到过六安的车店、戚桥、椿树，霍邱的姚李等集镇，最远的到过河南省淮滨县的蒋集，往返七、八天，它比短途多挣钱。

搬运工人喜欢上长途，但实际上大多活计为短途。所拉货物往往由甲地到乙地，先装，再拉，卸卸。装卸麻烦，卸卸容易。短途通常是跑了一趟又一趟，路虽不远，装卸不停，显得烦人，生活如此，也无法避免。长途呢？往往一装一卸就是一两天。搬运工人是“恨载不恨路”，即是喜欢装载多，不怕路途远，长途到了卸货地点，如果运气好，遇上别的地方，回来时不放空，两头挣钱，人虽辛苦，收入增加，乐得如此。

装卸货物也有讲究。拉树、拉毛竹捆绑在车上，板车的两轮成为杠杆支点，拉起来很轻松，跑起来也快些，工人称为“跑车子”。反之，拉砖瓦、拉石头、拉生铁锭等货物在车上，走起来车子沉，弹性小十分费力，

一步不用力，车子一步也不走。遇到上坡就更费力一些；如若遇到拉麻秸，体积小，重量轻，拉起来算是幸运了；拉生石灰，体积也大，重量更轻。不过大块的“滚子灰”少，“面子”灰多。装时啥人还不显分量，卸时更加啥人异相，头脸、衣服满是石灰，口罩也显得无能为力，穿草鞋的双脚更是吃不清，连洗澡也要多洗两遍；拉砖渣，所谓砖渣是碎砖、半截砖专用小铁锤砸烂，大小如拳头，用来填堵墙角，充作墙基。老百姓砸成的砖渣堆在地上准备卖钱，你搬砖渣上车箱，必须从底部搬起来才上墩。如果从砖渣中上部搬，忙半天也搬不动。它绝不像拉河沙，随便怎么搬都可以；拉砖，装卸最好用砖夹，一次夹五块，一辆板车至少装120块，最多140块，小板车的标准承载力为600斤，每块砖为5斤，超过太多，车内易易爆(即工人说的“打炮”)，那就麻烦了。实际上工人多用手来搬砖。条件稍好些戴上手套，避免砖棱扎手。以上可见拉小板车的装卸虽是粗活，也有一点小窍门。如若不懂、不会，那就既出力又效率低。

上下坡，拉车人喜欢平路，但实际上走起路来，或是上坡或是下坡。拉车人怕上坡，也并不喜欢下下坡。如果遇上陡坡，常常是歇下自己车子，三、四个人互相帮着推上坡顶，俗称“盘坡”，这件事费力、更费时。如果遇到漫上坡，那就各人凭力气，凭耐力，慢慢地拉，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直到上坡顶。拉车人常说：“拉车子是弯腰搬屁股，四个爪子落地”、“汗珠落地摔八个”的活。下坡，特别是下陡坡是很危险的，拉车人两只胳膊紧靠车把，把车子起来，尽量途中歇下后小拖对路面的摩擦力，用以减缓冲击力，降低速度。如果初次拉车缺乏经验，车子甚至一下子翻过来，以至砸伤自己。我父亲就遇到这样的事：下坡时车子越跑越快，人也控制不住，结果两个车把插在路边的水田里，人总算没伤着，真是一大幸事。可见，出体力拉小板车的活计非常辛苦，甚至还担些风险。

吃饭之事要看长短途。短途通常是自家烧，或是烧吃后去接活，或是家人送饭，晚上再回家烧。中午家人送饭时，饭后家人当起小帮子帮助拉车。所谓小帮子，就是在车把一侧或左或右挂上一根绳子，可以挎在肩上，平路，尤其是在上坡时帮助推车出力，减轻拉车人的劳力。大多是五十开外的老年夫妻，有时也叫子女当小帮子，替父亲出力。我暑假时多次替父亲当小帮子，甚至到过前文说的蒋集。倘若上长途，只有在饭店就餐。我随父亲去蒋集时，饭店一餐是一毛钱饭、一毛钱菜，吃得饱饱的。那时来是九分八厘一斤，饭店供应半斤米饭，只图赚个菜金的。乡村开饭店的人真是诚实厚道，不赚“迷心”钱。

1956年合作化后，拉散车也好，挂名小集体的车架组也好，统统进了六安县搬运站，并分成了几个大队。原先大轱辘的小板车，逐渐被载重量大(满载可达两千斤)又不易爆胎的小轱辘板车所代替。各大队都有自己食堂，工人早晨上班前，先去食堂吃饭，人称吃“扒眼饭”。中午食堂还送饭，条件大为改善。

其后，搬运装卸不只是小板车，还有了大平板车、三轮车、汽车，道路也逐渐变好，出现了柏油路、水泥路，其工作效率比往年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那袋花生

周长春

楼上的那袋花生已经有三年多了，袋子已经粉了，一摸就烂。中途剥了几次煮稀饭，味道香得很，好好的，还没有走油。这袋花生是我岳母三年前秋季给我们的，是庙后的一块空地种出来的，可物是人非，岳母已离开我们三年多了。

二十多年前，我和我夫人经人介绍认识的时候，我很穷，还欠下一屁股债，那时我很瘦，一看就是个穷小子，我岳母听说我母亲不在了，看起来人不坏，便心生怜悯，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正月第一次拜年时，她在厨房一直忙着，等我们吃完，她才用一个单路的火锅，打着干乎乎没油的咸菜吃。事后我才知道，我岳母吃素，闻到肉味作恶心，事后想想，那顿饭的确实为她了。

结婚时，我岳母一切替我想，让我们一切从简，省去了很多没用而又要花钱的环节。我们从理发店做了简单的化妆就直接到酒店去了，没有从我岳母农村老家出发，省去了不少车费。有时，说到这事，我觉得对夫人挺亏欠的，我从心底里感激岳母能帮我度过人生艰难而困苦岁月。

结婚第二年，我夫人怀孕了，知子莫如母，母女连心，就在我夫人临产的那天上，我岳母拎着一篮子鸡蛋来了，进门就说，这几天晚上在家老睡不着，心里毛糙糙的，感觉有事，就来看看。傍晚，我夫人肚子疼得厉害，要临产了。晚上，我夫人被推进产房，我一直很紧张，我岳母站在产房门外过道的窗户口，眼睛看着外边，嘴唇在蠕动，好像在祷告神灵的保佑。这时，外面很暗，突然乌云密布，还打着炸雷，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八点半，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母子平安。岳母此刻却坐了下来，几天没有睡好觉，耗了她很多心力和体力。那时我工作不久，正好带初三毕业班，她说孩子小晚上吵人，第二天不上课，会误了人家孩子，就把我夫人和孩子接回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老家做月子。那一届初中我班中考结果出奇得好。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多次表扬我，同时得到家长的认可。其实，这都与我岳母的支持和付出分不开的。

后来孩子上小学三年级了，她提出要回去，要干她心中的大事——要盖一座庙。我们开始都反对，后来见她意志坚决，随她性子，只要她快乐就行，人有信仰总是好的，它能引领你前行、向善。她用几年的功夫，盖了四间大房子，里面供奉着许多尊佛像，房子的两边还盖了一座偏房。她在周围做着善事，每到庙会 and 农历七月十九，周边的人都来上香。每次我们去时，她总是津津乐道地说着周边谁的病被她治好了，我就靠近她的耳边说：“妈，小病忍治，大病还是让人到医院啊。”她看着我，高兴地地点着头。

她偶尔到我家来，总说孩子上学，不打扰了。临走时一再交代我们生活要勤俭，不能浪费粮食，我儿子听姥姥的话，养成了吃完饭时碗里一粒不剩、人走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后来一段时间，她晚上打电话

过来，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交待我们待人接物的道理，尤其交代我夫人，不要逞我强，你们你们吵架，肯定是我夫人的错。

八月的一天，我接到夫人从医院打来的电话说姥姥高血压快不行了，我赶到医院时，她已昏迷，脑室瘀血过多，时间太长，已无抢救可能。回到家时，姥姥躺在床上，喘着粗气。我在她耳边轻声地喊着她，她没有反应，可我当时一直在想她一生太累了，她是在休息，可能不久就会醒来，后来就一直未曾醒来，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楼上柜子上的花生，我想还是一直留着它吧，它像母亲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日常做事的品行和为人，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念想。

夕阳佳苑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mail:784542876@qq.com